



章太炎：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

民国时期最有价值的国学大师讲稿

章太炎 著 杨佩昌 整理

 中国书画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馆

DASHIJIANGGAO

民国时期最有价值的国学大师讲稿

章太炎：在苏州国学 讲习会的讲稿

章太炎 著 杨佩昌 整理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章太炎·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 / 杨佩昌整理.

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0. 2

ISBN 978 - 7 - 80220 - 716 - 5

I. ①章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国学 - 文集 IV.

①Z126. 2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6893 号

章太炎: 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

出 版 人: 田辉

责任编辑: 梅逸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68469781 (发行部)

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qh1985@126.com

印 刷: 三河德利印刷厂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0 - 716 - 5

定 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导 言

章太炎是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著名国学大师。

章太炎 1869 年 1 月 12 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，父亲曾任县学训导，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。9 岁时外祖父就对其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。13 岁在父亲和表兄的指导下研读许慎《说文解字》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、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、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等，打下初步汉学基础。16 岁时参加县试，癫痫病突然发作，没有考成。从此放弃科举，广泛涉猎经史子集。

1895 年章太炎 28 岁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，章太炎加入康有为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强学会。从此走上了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的道路。

1903 年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，结识邹容、章士钊等。五月，邹容写成《革命军》，章太炎为其撰序，并发表《致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6 月 30 日，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，制造“苏报案”，章太炎被捕入狱。次日，邹容自投入狱。次年章太炎被判刑三年，邹容被判刑两年。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。

1906 年 6 月章太炎出狱，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，遂东渡日本，加入同盟会，主办《民报》。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，章氏发表演说，认为当前最紧要的：“第一，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，增进爱国的热肠。”10 月，成立国学讲习会，作《论诸子学》等讲演。

1907 年 2 月，章太炎、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。9 月，梁启超、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。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。4 月，章太

炎与张继、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，主张“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”。

《民报》成为揭露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，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，“所向披靡，令人神往”。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。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，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《民报》，将章太炎传入警署。章太炎二人牢狱。11月26日，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，章太炎据理辩驳，无懈可击，裁判长张口结舌、理屈词穷。但是，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。鲁迅、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，章太炎获释。

1911年，武昌起义，消息传到东京，章氏中断讲学，回到上海。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：“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。”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，章太炎以“革命军兴，革命党消”告之。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中华民国联合会上海宣告成立。章太炎、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。章太炎发表演说：“本会性质，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。”认为“中国本因旧之国，非新辟之国，其良法美俗，应保存者存留之，不能事事更张也”。

1913年3月，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。章太炎怒不可遏，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，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。“虽经友人力阻，而先生则谓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遂于八月冒险入京。”章太炎到京后，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，径闯总统府，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，大有祢衡击鼓骂曹的气概。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，继又囚于龙泉寺，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。1916年3月，袁世凯忧惧而死，章太炎才获自由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日本的侵略，再次激起章太炎的民族义愤，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冒着炮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、吴佩孚，劝他们抗战，后又通电怒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：“国家危急至此，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，平日整兵治戎，所为何事？应即督促前进，自谋靖献。如犹逍遥河上，坐视沦胥，此真自绝于国人，甘心于奴隶者矣！”

在革命面前，章太炎表现得如此决绝和自若，而面对未竟的学术事业，他则往往饮恨在心，不能释怀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章太炎是革命先驱，也是国学泰斗。历史学家侯外庐说：

“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。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，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。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，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。”

章太炎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，充满激情，百折不挠。因为，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——“念佛不忘爱国，爱国必须念佛”，章太炎则是“革命不忘治学，治学必须革命”。黄季刚在《太炎先生行述记》中说：“其授人国学也，以谓国不幸衰亡，学术不绝，民犹有所观感，庶几收硕果之效，有复阳之望。故勤勤恳恳，不憚其劳。”

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，一生特立独行、卓尔不群，鲁迅为之倾倒，说：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，留在革命史上的，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”“考其生平，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者，并世亦无第二人；这才是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范。”

1908年《民报》被禁，章太炎在东京创办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“专务历学”，“弟子至数百人”。1913年至1916年，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，章太炎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听讲学子，约100多人，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。与此同时，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“孔教会”，以“孔礼”为“国教”，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。章太炎“甚非之”，在钱粮胡同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门外贴出告示，言明“凡参加‘孔教会’者，不得入内听讲”。

1935年9月，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章太炎授课之时，“听者近五百人，济济一堂，连窗外走廊等地，也挤满了人。”

章太炎1934年秋举家由上海迁至苏州，从此在苏州定居讲学。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筹办期间，组织章氏星期讲演会，章太炎共讲九期，由弟子王謩、吴契宁等人记录，后行刊出版，目次分别为：《说文解字序》、《白话与文言之关系》、《论读经有利而无弊》、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》、《再释读经之异议》、《论经史儒之分合》、《论读史之利益》、《略论读史之法》、《文学略说》。本书“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”，将前八期收集，其中第九期《文学略说》放至“章氏

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”部分中。

“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”是讲习会第一期的内容，由章太炎亲自讲授，由弟子王乘六、诸祖耿记录，是为应全国学术界要求，每一门课讲毕，都要记录成册，刊印发行。这些内容都是章太炎治学的心得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内容丰富而充实，讲解全面而系统，深入浅出而不乏精见卓识。

章太炎讲课时已患病在身，讲课中常常气喘不止，他后来不能进食，仍要坚持授课，并曰：“饭可不食，书仍要讲”。1936年6月14日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病逝于苏州，当时被人们评为“革命元勋，国学泰斗”。

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，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，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目 录

星期讲演会记录

第一章	说文解字序	3
第二章	白话与文言之关系	13
第三章	论读经有利而无弊	18
第四章	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	24
第五章	再释读经之异议	32
第六章	论经史儒之分合	40
第七章	论读史之利益	48
第八章	略论读史之法	53

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

序	63
第一章 小学略说	65
第二章 经学略说	96
第三章 史学略说	153
第四章 诸子略说	181
第五章 文学略说	229

章太炎

星期讲演会记录

第一章 说文解字序

王 簪 王乘六 吴契宁 诸祖耿记录

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视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《易》八卦，以垂宪象。

《说文》九千字，小篆杂以古籀。何以偏主小篆，不专以古籀为主？盖古文笔画淆乱，不能尽以六书解说，而籀文十五篇，已亡其六也。居今而言，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，其所以首举八卦者，大抵初造之文，有若干字取诸卦象。☵为水，盍字从之。☲为火，古之火字作𤔁。☴为气，天积气也。气作𤔁，义与天同。☷为州，汉人书坤作𤔁，地之大者，无逾九州，故州字重𤔁而书作𤔁。其余震兑艮巽，不与初文有关，盖造字时去取各有宜耳。

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，庶业其繁，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蹏远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。初造书契，百工以义，万品以察，盖取诸夬。夬扬于王庭，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，君子所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也。仓颉之初作书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谓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谓之字。文者物象之本，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。箸于竹帛谓之书，书者如也。以迄五帝三王之世，改易殊体，封

于泰山者，七十有二代，靡有同焉。

契者，刻画作凭信也。古人造字，本以记姓名，立券契。尔时人事简单，人我所需，惟此而已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项羽之言：“书足以记姓名而已。”语本非谬，其后人事愈繁，文字之用乃广。行文立言，皆后起之事也。仓颉初造之文，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。指事者，象形之广义也。若两文合而成字者，非会意，即形声。仓颉时尚未有此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者。字字叔重训乳，乳即产生之意。《易·屯》：“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”此字之本义也。文本无多，两文相合，孳乳日益，遂名曰字。或谓字之一言，春秋时尚无其称。《论语·子路》“必也正名乎”，《仪礼》“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”，名者，今所谓字也。或曰书，或曰文，于古未有言字者，称字殆自秦始。此语不然。古人幼名冠字，字之云者，谓由名孳生之别名耳。秦以前人，已有名复有字，何得谓为始于秦哉！古文变化繁多，封于泰山二语，本诸《管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，事证不详，理或然耳。

《周礼》：“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书。”一曰指事。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二二是也。二曰象形。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诂诂，日月是也。三曰形声。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。四曰会意。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𠄎信是也。五曰转注。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六曰假借。假借者，本无其事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。

小学者，儿童识字之学也；六书者，古人造字之法也。宇宙万彙，有可以指其事而为文者，二二是类是也。有可以象其形而为文者，㊦㊧之类是也。然象形、指事，可施于名物者多，可施于动作者少，于是乃有形声、会意之例。止戈为武，止戈者止人之戈也。语本楚庄王，谓禁暴戢兵方谓之武。然此恐是一时美谈，未合初义。《书·牧誓》：“不愆于六步七步，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”。今步伐二字，人人沿用，窃意武之云者，会步伐之意而已。止者步省，戈者伐省。

军令森严，步伐整齐，此所谓武矣。叔重袭楚庄王之意，沿用古训，不取异说，故云然耳。人言为信，三体石经信作𠄎，从千不从人，千人之言必可信。十口相传谓之古，意义正同。千之古音如人，则信、𠄎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。转注假借，异说最多。余谓“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”者，兼以音义言之。考之与老，义既匪二，音复相近，此所谓转注也。未造字时，先有语言，方音有殊，名义则一。其音或双声相转，或叠韵相移，则为更制一字，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。虽二字，实本一字，此转注之义也。“本无其字，依声托事”者，谓造长短之长，不造长幼之长。造命令之令，不造县令之令。县令发令于众，长者长于幼小，号令之令，长人之长，即托于命令、长短之字以行也。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，其义乃泛。信如其说，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，何必如此繁琐哉？且文字之用，本以治万民、察百官，广同音通用之道，势必交错纷纭，不可究诘，百官乃不得治，万民乃不得察，适足增治丝之棼耳。揆其初意，盖以经典相承，文有音讹，不敢指斥其非，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。自汉以来久有此说，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。余谓假借云者，意相引申，音相切合，义虽稍变，不为更制一字。如令、长之类，托其事于命令之令、长短之长，引申其义，不别为一字，然后文字不至过繁，此与转注之例，相为正负，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。

及宣王太史籀著《大篆》十五篇，古文或异。至孔子书六经，左丘明述《春秋传》，皆以古文，厥意可得而说。

造文字者仓颉也，正文字者史籀也。史籀《大篆》十五篇，至叔重时，仅存九篇。古文沿袭多讹乱，不尽可以六书解，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。今三体石经之古文，为叔重书所不收者，亦有可以六书解者，然不甚多，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。盖文字沿用既久，势必日趋谬误。是正文字者，后有李斯，前有史籀。古文笔画既少，结体亦不方正，大篆改之，为之增加笔画。笔画重叠，则不易混淆，此史籀之苦心，石鼓文在，可证也。孔子、左氏，后于史籀。史籀为王

朝太史，是正文字之后，后人应奉为准则。而复沿用古文者，六经中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诗》，《诗》除《国风》外，均史籀前书，流行民间，为日已久，史籀不及改也。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，史籀之力，仅及王畿千里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。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，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。叔重尊尊壁中书，故曰其意可得而说，实不可尽说也。

其后诸侯力政，不统于王，恶礼乐之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，分为七国。田畴异亩，车涂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。秦始皇帝初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。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大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是时秦烧灭经书，涤除旧典，大发吏卒，兴戍役，官狱职务繁，初有隶书，以趣约易，而古文由此绝矣。

七国文字，与春秋不同，然无特异之名，今亦不可知（《凡将》、《训纂》或有七国时字）。文字异形，淆惑自生。秦既并天下，同文之举，自不容缓。李斯等所作《仓颉篇》，今所谓小篆也。小篆之前，秦所用皆大篆。秦本周地，史籀造大篆，不行于关东，而行于关内，秦器盥和钟，文字方正，略同大篆，可证也。其后秦尊视大篆，依倚以成小篆，所谓省改者，以大篆太繁，故略有省改耳。秦以法治，事须明白，古文易乱，不得不废。废古文，以其背法治；焚诗书，以其易立异，意正同也。然仍有用古文者，秦碑“及”作𠂔，二十六年，“二十”作𠂔，皆古文也。峄山碑，𠂔从十不从𠂔。十，𠂔古文也。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，盖碑版美观，用意不同耳。

自尔秦书有八体，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

张怀瓘《书断》引《吕氏春秋》“仓颉作大篆”，今《吕氏春秋》无此语，或古文亦称大篆，事未可知。刻符文字，今于汉铜虎符见之，字体并无稍异。虫书即所谓鸟篆。摹印者，刻玺之文，宋人摹

秦玺文，见薛尚功《钟鼎款识》，字体甚奇，书于旗帜者亦然，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。署书所以题榜，殳书所以书觚，汉瓦当文，随圆势而结体，亦其意也。刻符、殳书，字体不变，虫书、摹印，加以花纹，为之不易，故别立门目耳。秦隶今难见，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，汉碑八分有波磔，东汉初年石刻，笔势似篆，全无波磔，与夫秦权、秦量所刻，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，殆皆所谓秦隶矣。

汉兴有草书。

草书之原甚早，不始于汉。《论语·宪问》“裨谌草创之”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“屈平属草藁未定”。疑古人已有，惟不立专名耳。二十并作廿，笔画连缀。旅古文本作𠂔，𠂔而又变作𠂔，亦取其本不连者而连之，是皆草书之滥觞也。

《尉律》：学僮十七已上，始试，讽籀书九千字，乃得为吏。又以八体试之，郡移大史并课，取者以为尚书史，书或不正，辄举劾之。今虽有《尉律》，不课，小学不修，莫达其说久矣。

《尉律》者，廷尉所守之法律也。讽籀书九千字，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，许书九千字皆籀文，然《仓颉篇》小篆仅三千字，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？段氏训籀为读，义亦未谛。《说文》：“讽，诵也。”讽籀书九千字者，取九千字之成文，以籀文书之，令受试学童，读而诵之耳。《尉律》虽定于萧何，本多摺摭秦法。秦作小篆以前，籀文盛行，及后焚书，而官书固在，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。逮及汉初，去秦未远，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但言讽书而无籀字，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。

孝宣皇帝时，召通《仓颉》读者，张敞从受之。凉州刺史杜业，沛人爰礼，讲学大夫秦近，亦能言之。孝平皇帝时，征礼等百余人，令说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礼为小学元士。黄门侍郎扬雄，采以作《训纂篇》，凡《仓颉》已下十四篇，凡五千三百四十字。群书所载，略存之矣。及亡新居摄，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，自以为应制作，颇改定古文。

孝宣去李斯作《仓颉篇》时，未及二百年，失其传授，已不能读，可知识字须有传授矣。汉初，六国遗老尚存，通古文者犹多。秦焚书时，高祖已四十余岁，应识古文，娄敬、陆贾、叔孙通辈，亦皆生焚书之前，其所征引，皆系古文。且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，皆用古文。欲传其学，非识其字不可，故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。《汉书》、《左氏》多古字古言，贾谊为作《训诂》。谊之学，受之张苍。然其在汉京之日，不过一年，如字字须苍亲授，恐《左传》十八万字，非一年之功所能为力。是知谊本自识古文，苍所教者，大义而已。又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上有古铜器，李少君以为齐桓公器，按之果然。又太史公《自序》年十岁则诵古文。可知当时识古文者尚众。宣帝时，故老云亡，书亦渐改为汉隶，故识古文者绝少，乃并《仓颉篇》而不能读，小学日衰，于是张敞、扬雄之伦，始以识字著矣。

时有六书，一曰古文，孔子壁中书也。二曰奇字，即古文而异者也。三曰篆书，即小篆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。四曰左书，即秦隶书。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。六曰鸟虫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

奇字为秦八体所无，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，不知扬何所受。今许书载四奇字，无（无）、𠂔（涿）、全（仓）、𠂔（人）是也。

壁中书者，鲁恭王坏孔子宅，而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又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。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即秦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虽叵复见远流，其详可得略说也。而世人大共非訾，以为好奇者也。故诡戛正文，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，变乱常行，以耀于世，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，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，云父子相传，何得改易？乃猥曰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。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，苛人受钱，苛之字止句也。若此者甚众，皆不合孔氏古文，谬于史籀，俗儒瞽夫，翫其所习，蔽所希闻，不见通学，未尝睹字例之条，怪旧执而善野言，以其所知为秘妙，究洞圣人之微旨。又见《仓颉篇》中幼子承诏，因曰古帝之所作也，其辞有神仙之术焉，其迷误不论，岂不悖哉！

叔重依壁中书录古文，其所不录而存于今三体石经者尚多。叔重说解文字，一以六书为准。古文淆乱，实有不能下笔者，故不能尽录也。又，古文一字数体，故钟鼎与三体石经往往歧异，云皆自相似者，亦概略之辞。钟鼎刻画，义取美观，字体正否，在所不计，亦如李斯作小篆，而所书碑石往往自乱其例，史籀作大篆，而自书石鼓文，亦不尽合六书。良以石刻本是美术，故不求字字审正尔。叔重考正文字，主于绳纠愆谬，故吐词不得不严，其实可免纠弹者，唯籀文而已。壁中经实亦有误，以尊古故，不得不为揜饰。鼎彝愈可知已。常行者谓隶书，诸生者谓太学诸生。斗，汉隶作什，故曰人持十为斗。苛读如诃，故曰苛之字止句也。东汉诸儒，如此说解者多，具于纬书中。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，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。东汉人疏于史学，以汉律为皋陶作（见《论衡》），以《仓颉篇》为仓颉作。此类甚众。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，亦无足怪。如无许书，妄说不知何底，许之功顾不伟哉？

《书》曰“予欲观古人之象”，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。孔子曰“吾犹及史之阙文，今亡矣夫！”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，用己私，是非无正，巧说衰辞，使天下学者疑。盖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寿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故曰“本立而道生”，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。

阙文者，别国之赴告，音义不明，不能强解，故阙之也。孔子晚年，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，故叹伤之。自古文字变更，本难全识，虽圣如孔子，亦未必尽识古文。不知不问，任用己私，妄加断议，此乃无根之谈，学者所宜屏绝。自许书之后，有《字林》，有《玉篇》，有《类篇》，承学之士，依以为准，不敢妄说。宋人侈谈钟鼎，即有不知不问人用己私之病。夫钟鼎在汉时，去古未远，犹可十识七八。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，相距约一千二三百，以一千二百年不传之字，而宋人忽妄云识之，乌可信哉？是故钟鼎释文，从来无一可据者。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，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，取其节奏